

台灣、去中心化與博物館： 從〈甲子萬年〉看故宮的百年轉型與未來

成大歷史系94級校友\許志全

在當前全球化高度加速的世界中，台灣位處地緣政治與文化流動的張力核心，這種結構性的複雜使台灣成為一個不斷被重新詮釋的場域，並形塑出一種獨特的「去中心化」特質。在這種視野下，博物館的核心從命令與支配的來源轉化為連結、轉譯與對話的節點。過去的博物館如同唯一而穩定的「恆星」，所有觀看都繞其軌道行進；而今日成形的去中心化博物館更像是一個「星系」，每一位觀眾、社群與生命經驗都是自帶光源的星體，使博物館成為關係生成的場域，而非觀看的終點。

南方的兩座博物館：差異如何成為意義

南台灣的兩座博物館——奇美博物館與故宮南部院區，正展現了這種極具啟發性的差異對話。奇美博物館的核心精神源自創辦人許文龍「為大眾而存在」的樸素初衷，其收藏拒絕菁英化，重視情感的可親近性。奇美將代表性的提琴典藏長期出借給音

樂家演奏，透過這種「活典藏」的實踐，將私人資源轉化為公共文化能量，使文化除了被保存的過去，也持續創造著未來。

相對而言，國立故宮博物院則承載著更為厚重的歷史重量與轉型張力。其館藏源多自宋、元、明、清四朝宮廷典藏，在1933年因戰亂啟動南遷，最終於1948年底至1949年初遷台，形成保存奇蹟。遷台初期，故宮作為「中華文化正統」的象徵，其敘事權威單一且穩固，負有強烈的政治宣示與國家敘事功能。

然而，隨著台灣社會的民主化與多元化，這種單一中心的敘事逐漸轉型。自2000年後，在杜正勝、石守謙與林曼麗等院長推動下，故宮導入本土視角，並籌設南部院區以回應南北文化資源不均的長期結構問題，敘事重心也從「中華中心」逐步轉向「亞洲各民族文化研究」。這種「去中心化」並非否定



其歷史價值，反過來思考故宮能否成為一個對話的起點，而非結論。

這種轉向於南院當前展出的〈甲子萬年：國立故宮博物院百年院慶特展〉（展期至115.03.01）中獲得集中呈現。展覽以百年為軸，回顧了1925年皇家私藏轉全民共享、1950年北溝庫房、1965年外雙溪新館落成及2015年南院開館等關鍵節點。范寬〈谿山行旅圖〉與郭熙〈早春圖〉等重器，連同反映點查歷史的「呂-1」編號，共同構成了制度與記憶的歷史座標。

展望未來，故宮透過「新故宮計畫」與「院慶100+」，將去中心化的實踐延伸至2026年以後。透過數位轉型與跨亞洲文明的多元敘事，故宮正努力轉化為一個「深耕在地，邁向國際」的公共文化節點。在這種語境下，我們試著來用四部分來進行「如何看博物館」這件事。



第一部分

從權力象徵到公共空間——博物館的演進與意義轉換

要理解故宮博物院在台灣脈絡中的「去中心化」，必須先回到博物館作為一種文化建制的歷史。博物館並非一開始就是為了大眾而存在，其起源本質上與權力、展示以及對世界的掌控密切相關。

博物館的早期雛形，可追溯至16世紀歐洲的「珍奇櫃」（Cabinets of Curiosities）。貴族與學者透過蒐羅異域奇珍、自然標本與藝術品，建構象徵知識與權威的私人微縮宇宙。這些收藏並非為了公共溝通，而是用以展示財富、學識與支配世界的的能力，其核心價值在於佔有與分類，而非分享與對話。

18世紀啟蒙運動帶來博物館意義的第一次轉換。隨著大英博物館與羅浮宮向公眾開放，博物館成為「公共性」的重要象徵，但這種公共性並不中立。透過展示從世界各地蒐集、甚至掠奪而來的文物，博物館成為建構國族認同與國家敘事的關鍵工具，文物被賦予文明高度與國家榮耀的象徵意義，並承擔起公民教育的功能。

20世紀中葉興起的「新博物館學」(New Museology)進一步質疑博物館的權威角色，主張博物館不只是保存與研究的場所，而應成為回應社會議題、促進公共討論的行動者。策展開始引入多元社群與經驗，去中心化的觀念也在此逐漸成形。

因此，當代走進博物館，從「看古董」轉變成主動參與的觀看實踐：觀看敘事如何被建構、權力如何流動，以及文物如何與當下社會產生對話。博物館由此成為一個需要不斷被提問與重新理解的公共場域。

第二部分

故宮在台灣的轉型——從「正統中心」到「多元對話」

故宮在遷台初期的核心意義，除了文化保存，更承擔「正統性」的象徵功能。在當時的政治語境中，故宮作為高度中心化的文化機構，其館藏被視為中華文化道統的物質載體，權威不僅僅來自文物本身的藝術與歷史價值，更來自國家敘事的加持。因此，故宮在博物館身分外，多了承擔了文化權力核心節點的要責，其敘事結構呈現由上而下、單一而封閉的特徵。

然而，隨著台灣社會民主化、多元化與世代更替，這種中心化模式逐漸顯露其侷限。今日談故宮的去中心化，嘉義的故宮南院是個重要轉捩點：其一是

地理上的去中心化，透過南院設立鬆動文化資源，長期集中在台北的結構，回應南北文化近用不均，使文化得以向外擴散並與地方社群建立關係；其二是敘事上的去中心化，南院定位為「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」，將中華文化放回亞洲文明網絡中，與東南亞、波斯、日本等傳統文化並置對話，使故宮由正統中心轉為跨文化交流的節點。

此外，數位化轉型亦是另一種去中心化：藉由開放資料、線上典藏與數位策展，文物進入可被研究與再詮釋的公共網絡，觀眾得以依自身經驗生成理解，逐步削弱單一權威敘事。面對此轉變，觀眾可嘗試兩個方向：從「物件」轉向「關係」，以及從「歷史」轉向「當代」，讓文物在今日台灣的認同、平權與全球處境中重新發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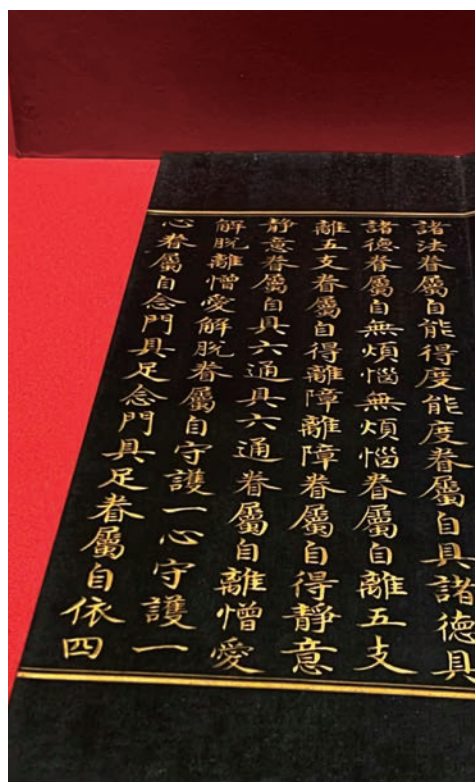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部分

去中心化的實踐挑戰——從「展示空間」到「接觸地帶」

當博物館（如故宮）試圖走向去中心化時，所面臨的挑戰難題並不只是地理展館遷移或數位科技導入，而是更深層的權力結構重組。去中心化迫使博物館重新思考：誰有權發言？誰決定敘事框架？哪些經驗被視為「有效的知識」？

在傳統博物館模式中，策展人與學者長期被視為知識的最高權威，文物意義由專業體系界定，觀眾多半扮演理解與吸收的角色。然而，去中心化要求博物館放下「唯一真理」的姿態，開始邀請社區居民、弱勢群體，甚至當代藝術家共同參與敘事生成。這在故宮的脈絡中尤其困難，因其館藏承載高度的歷史重量與學術嚴謹性。真正的問題不在於是否去中心化，而在於如何在維持專業研究的前提下，容納多元、甚至相互矛盾的民間觀點，而不流於象徵性的展示。





人類學家詹姆士·克里弗德（James Clifford）提出博物館作為「接觸地帶」（contact zone）的概念，為此提供了重要視角。在此理解下，博物館不再只是靜態展示物件的空間，而是不同文化、歷史記憶與意識形態相互碰撞、協商的場域，意義並非預先完成，而是在互動中生成。故宮南院透過亞洲織品、茶文化、佛教文物等常設展覽，使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在展廳中辨認自身位置，正是將「中心」分散給多重文化經驗的嘗試。

在去中心化語境中，「如何看博物館」的關鍵轉向觀眾的主動性。觀看不再只是接受解說，而是提出提問：哪些敘事被強調？哪些被忽略？不同背景的觀眾，將文物轉化為不同的理解與連結。去中心化的博物館，正應為這種差異化的意義生產保留空間，成為一個需要不斷被參與與回應的公共場域。

第四部分

台灣博物館的未來展望——在全球化與本土化之間的動態平衡

在完成博物館的歷史演進、制度轉型與去中心化實踐的討論後，最終仍須回到一個核心問題：故宮在台灣的未來，將扮演什麼角色？

去中心化的目的，並非否定核心，而是將「中心」從權力的終點，轉化為關係的起點。未來的故宮，不再只是中華文化的保險箱或正統象徵，而是蛻變成一個能持續生成連結的亞洲文化節點——一方面連結台灣社會內部多元的歷史經驗，另一方面也連結全球不同文化的觀看視角。

在國際層次上，透過與羅浮宮、大英博物館等機構的聯合特展，故宮得以將自身館藏置入全球藝術史與文明交流的脈絡中。這更是一種敘事位置的轉換：台灣從被觀看的對象，成為能主動參與文化詮釋的行動者，博物館也因此成為台灣軟實力的重要載體。

在島內層次上，透過南院經營、全台巡迴教育與地方合作，文化資本得以被去中心化地重新分配。博物館的意義從中央機構定義逐漸走向由在地社群、教育場域與不同世代共同協商，文化從被仰望的高點，轉為可被使用、討論與轉譯的公共資源。

隨著 AI、VR 與區塊鏈等技術成熟，博物館也將更深嵌入數位生活。去中心化實踐將延伸至虛擬空間，觀眾甚至能自組展覽、重構敘事，鬆動策展權力的單一集中。同時，博物館也將更積極回應氣候變遷、文化平權與科技倫理等當代議題，成為與社會共同呼吸的有機體。



總結

如何看博物館——一種自省式的觀看

在去中心化的時代，觀看不再是被動接受，而是一種自覺的實踐。我們或可帶著三個覺察走進博物館：覺察敘事背後的權力、覺察自身立場如何形塑理解，以及覺察文物與當下台灣社會的連結可能。當博物館不再提供唯一答案，而邀請我們進入對話，觀看本身，便成為一種公民行動。